



浙江学人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Zhejiang's Scholars and Modern Chinese Archaeology

项隆元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江学人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Zhejiang's Scholars and Modern Chinese Archaeology

项隆元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学人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 项隆元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 4
ISBN 978-7-308-20502-3

I. ①浙… II. ①项… III. ①文物—考古—浙江
IV. ①K87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59764 号

浙江学人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项隆元 著

责任编辑 吴超 宋旭华

责任校对 杨利军

封面设计 周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305 千

版印次 2021 年 4 月第 1 版 202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20502-3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章炳麟与初期的考古学	
——近代考古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17
第一节 西学的传播与近代学科门类的确立	18
一、西学的传播	18
二、近代学科门类的确立	21
第二节 早期考古学知识的传播	23
一、地学著作的译介与考古学知识的传播	23
二、史学著作的译介与考古学知识的传播	26
第三节 章炳麟与新式中国通史	29
一、章炳麟新史学观与考古学	30
二、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与近代考古学知识的运用	37
第二章 孙诒让与甲骨文研究	
——甲骨文发现与甲骨学创立	42
第一节 朴学大师的治学历程	43
一、学术积累期	44
二、学术成就期	46
三、学术拓展期	50
第二节 从《铁云藏龟》到《契文举例》	53
一、殷墟甲骨的发现与《铁云藏龟》的印行	53
二、《契文举例》的问世	58
第三节 孙诒让甲骨文研究的成果及影响	61
一、甲骨文研究的成果	62
二、甲骨文研究的影响	68
第三章 罗振玉与古器物研究	
——从金石学到古器物学	75
第一节 罗振玉的生平与著述	76

一、早年的求学与创业	76
二、入仕教育部门与旅居日本	78
三、追随溥仪与后期学术生涯	81
第二节 新出古物研究及其影响	82
一、甲骨文字的著录与研究	85
二、汉晋简牍的整理与研究	91
三、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94
四、大内档案的保存和整理	99
第三节 从金石学到古器物学	102
一、清代金石学的兴盛	102
二、罗振玉的金石刻辞研究	108
三、古器物学的提出	114
第四章 王国维与“二重证据法”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声	119
第一节 王国维的主要经历与治学活动	120
一、早年经历与早期治学活动	121
二、东渡日本与“新史学”的开创	126
第二节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形成	128
一、《古史新证》与“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128
二、“二重证据法”的形成过程	134
第三节 “二重证据法”形成的原因及意义	146
一、“二重证据法”形成的原因	146
二、“二重证据法”的意义	151
第五章 马衡的金石研究与考古探索	
——从书斋考古到田野考古	156
第一节 马衡的生平与学术活动	157
一、早年的学识积累时期	157
二、受聘北大和学术成熟时期	159
三、守护故宫博物院	161
第二节 马衡与金石学研究	164
一、甲骨与铜器研究	164
二、书籍制度与度量衡制度研究	167
三、石刻与石经研究	170

第三节 走向近代考古学	172
一、马衡从书斋考古走向田野考古	172
二、传统金石学与近代考古学的关系	180
第六章 施昕更、何天行与良渚文化	
——中国江南田野考古的尝试	186
第一节 施昕更与《良渚》	187
一、投身文博	187
二、《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189
第二节 何天行与《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	196
一、痴情考古	196
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	198
第三节 浙江史前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201
一、良渚文化研究的进展	201
二、浙江其他史前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206
第七章 夏鼐的考古学成就	
——20世纪中国考古学进展的认识与反思	214
第一节 夏鼐的求学生涯	215
一、求学经历	215
二、四次学业选择	220
第二节 夏鼐的学术成就	227
一、史前考古学研究	228
二、历史考古学研究	234
三、中外交通史研究	239
四、中国科技史研究	243
第三节 20世纪中国考古学进展的认识与反思	251
一、王国维、梁启超对考古学的认识与期望	251
二、李济、夏鼐对考古学的总结与反思	253
结 语	258
参考文献	261
后 记	267
补 记	268

绪 论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学术变迁的结果。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既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大变革的时代,作为社会和文化体系中产生知识、观念的领域,中国学术也经历了一个“除旧布新”的大变革过程。这一变革过程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西方学术文化的大规模传布和各部门近代学科的相继建立,由此打破了中国原有的“经、史、子、集”学术分科,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的变迁。与众多近代学科门类一样,中国近代考古学也是在这一变革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产生无疑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传统学术的演变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张光直在谈及近代考古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时,就认为传统金石学的成就与近代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一样,同样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主要学术来源。^① 也就是说,中国近代考古学是中西学术文化交融的产物,它既有鲜明的“西学”特征,又有浓重的“国学”色彩。

浙江号称“文物之邦”,传统学术向来发达;近代以后,浙江学术又开时代风气之先。因而,集“国学”和“西学”于一体的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与近代学术大变迁背景下的浙江学人的探索有着密切的关系。

—

任何一种学术变迁,一方面会随社会变革而显示出发展的阶段性,另一方面也会循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而呈现先后相接的连贯性。因此,梁启超在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讲义时,开篇就告诫学生:“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②若要认清 19 世

^① 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3—14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 页。

纪末 20 世纪初浙江学人的学术变迁,同样有必要对整个清代的浙江传统学术做一番概要性的梳理。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清代初期的学术与明朝的阳明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后浙江学人的学术主流也是在阳明学派的延续、修正、反思和立新中确立起来的。

由余姚人王守仁(号阳明,1472—1529)开创的阳明学派影响深远,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明初程朱理学取得独尊地位之后,虽使朝廷“一道德而同风俗”^①的意图得到实现,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学术生机受到严重压抑。这从明朝名儒薛瑄的“自考亭(指朱熹——引者)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②的表述中,已可以窥见当时知识界为学活力的式微。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沉寂格局,给明代学术注入新活力的便是王阳明。与众多的明代学者一样,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也是从接受程朱理学开始的。所不同的是,王阳明十分注重学求自得,不盲从“圣贤”之言,在经历了“学凡三变”的曲折过程之后,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对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曾作过简明扼要的概述:“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③王阳明虽年未及六十而辞世,但他的“致良知”学说及其所著《传习录》等,不胫而走,深入朝野。他所开创的阳明学派,也逾越浙江地域,成为明代中叶以后风行南北的学术主流。

阳明之学的崛起,冲破了明初以来烦琐、僵化的学术樊篱,给沉闷的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但是到明代末叶,政治黑暗,思想禁锢,阳明之学也失去了原有的生气。明亡后,阳明学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一些深怀民族感情的知识分子感到宋明末学空谈之害,不约而同地将失家亡国之恨泼在阳明学身上。于是,清初非难、修正阳明学的呼声如怒涛拍岸,涌现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奠定清学基础的一批学术大师。对此,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顾、黄、王、颜,同一‘王学’之反动也,而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黄氏始终不非王学,但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顾、王两氏黜明存宋,而顾尊考证,王好名理;若颜氏者,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

① [明]程嗣功、王一化:《应天府志》卷一八,明万历刻增修本,第 522 页。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二,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22 页。

③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清道光重刻本,第 114 页。

亦非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①梁启超将“清学”看作是从反宋明理学，首先是反阳明学而逐渐建立起来的，可谓一语中的。不过，清初学者对阳明学的态度有所不同，作为王阳明的同乡，黄宗羲“始终不非王学”，其对待阳明学的态度显然要比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平和得多。

黄宗羲(1610—1695)对待阳明学的态度平和，并不意味着没有立新。他虽然学承刘宗周，远宗王阳明，但立足于“天崩地解”的社会现实，将王、刘之学廓而大之，其学术已不是理学旧规所能包括。黄宗羲认为“儒者之学，经纬天地”^②，主张合学问与事功为一，以期救国家之急难。由于志存经世，因而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学问，他都广为涉足，著述繁多。所著《明儒学案》凡62卷，纵贯有明一代理学源流，上起明初吴与弼，下迄明末刘宗周，网罗理学家200余人，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断代学术史专著。为存一代典章人物，他遍阅明人文集，区分类聚，荟萃成编，辑为卷帙浩繁的《明文海》，全书所涉近2000家，为一代文章渊藪。所著《明夷待访录》，博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既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又规划出内容广泛的变革方案，尤其是蕴含的对君主专制政权体制的批判思想，在有清一代留下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

黄宗羲既是开一代风气的学术泰斗，也是成就卓著的教育家。他一生讲学四方，弟子遍布两浙，尤以浙东万斯大、万斯同兄弟最为著名。

万斯大(1633—1683)，博通诸经，精研三礼，著有《仪礼商》《周官辨非》《礼记偶笺》《礼记集解》《学礼质疑》《学春秋随笔》等。其“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③的治学方法，对清代“汉学”的发展很有影响。

万斯同(1638—1702)，博通诸史，尤精明史，一生著作甚丰，有《儒林宗派》《历代史表》《石园诗文集》《两浙名贤录》《读礼通考》等数十种，特别是对《明史》初稿的完成贡献尤多。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清初史学之发展，实由少数学者之有志创修明史，而明史馆之开设，亦间接助之。其志修明史者，首屈指亭林、梨洲，然以毕生精力赴之者，则潘力田、万季野、戴南山。”^④然顾亭林(顾炎武)、黄梨洲(黄宗羲)有志修明史而未能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② [清]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三，清康熙刊本，第163页。

③ [清]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八，清康熙刊本，第98页。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05页。

修,潘力田(潘怪章)、戴南山(戴名世),又皆死于清代文字狱,只有万季野(万斯同)以布衣的身份参与修撰《明史》。万斯同为官修《明史》的成书,可谓鞠躬尽瘁,耗尽心力。

至清代中期,着眼于考证的清代“朴学”已臻如日中天的境地。这一局面的形成,从外在环境看,是与清廷统治趋于稳定和大兴文字狱有关;而就其内在逻辑看,清初的批判、反思理学思想正是它形成的先导。清初批判、反思理学的思潮本身就带有两重性,一方面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另一方面又具有浓厚的“复古”“法古”倾向,只不过在高涨的经世致用的呼声下,“复古”“法古”的声响较为低沉,并不显露。随着清廷文化专制的加剧,批判、反思理学思潮的双重性发生地位转换,以“复古”“法古”为特征的朴学逐渐取代了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学术思想而成为主要方面。清初萧山人毛奇龄、德清人胡渭着眼于纯学术考证的倾向,似乎已预示着朴学时代即将到来^①。

毛奇龄(1623—1716),其治经虽犹存理学旧辙,但他认为“汉去古未远,其据词解断,犹得古遗法”^②,因而表彰汉学,崇尚考证。通过论《大学》无古今文之殊,辨宋儒《易》说之非,定《太极图》非儒家正传,斥《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为伪作等,为继起者开诸多路径。

胡渭(1633—1714),学风不尚泛博,所著仅《禹贡锥指》《易图明辨》《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数种,但影响颇大。尤其是《易图明辨》,考定宋儒所谓“河图”“洛书”之误,虽无“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③,其对清代学术的意义,后人给予了高度评价。

乾隆、嘉庆时期,朴学鼎盛。此时,浙江学人从事经史研究者为数众多,成就突出。其中,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大师的史学研究,更为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术支撑起半壁江山。

鄞县(今宁波鄞州区)人全祖望(1705—1755),上承黄宗羲、万斯同,下启邵晋涵、章学诚,博通经史,尤熟于明末清初史事。他三笺《困学纪闻》,补辑《宋元学案》,七校《水经注》,成为乾嘉史学文献派的代表。

余姚人邵晋涵(1743—1796),经学、史学并举。曾入四库全书馆任编修,主持《四库全书》史部编撰,史部提要大多出其手。其经学著作《尔雅正

① 乾嘉学派是指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逐渐发展成熟的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的学术流派。因为此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又因此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故而有“朴学”“考据学”之称。

② [清]毛奇龄:《易小帖》卷一,四库全书本,第14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义》开清儒重新注疏儒家经典之先河。其史学、经学成就为当时学者及后人所推崇。

绍兴人章学诚(1738—1801),其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更大。乾嘉学风,以经学考据为主流,针对汉学考据的积弊,章学诚提出两条匡正之道:一是古文辞,二为史学,而归根结底还是史学。章氏所提“六经皆史”^①说,更使人耳目为之一新。正如钱穆所言:“章学诚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是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的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②

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由盛而衰,乾嘉学术远离实际的学风弊端也逐渐显现。一些思想敏锐、开放的浙江学人,开始抛弃保守且脱离实际的古文经学和理学,选择了今文经学^③以应世变,从而使一度寂静的经世思想再度崛起。

最早是嘉庆末年曾从外祖父段玉裁治朴学的龚自珍(1792—1841),喊出了“更法”的时代呼声。他所撰的《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皆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他援引《公羊》以经世,提出治、乱、衰三世递变的历史循环论,给公羊学的“变易”观注入务实求变的内容。这种历史进化观虽显粗略,并带有些许“幼稚”,但开假《公羊》以言社会改革风气之先河。继而在道光、咸丰年间,杭州人谭献(1832—1901)、德清人戴望(1837—1873),也以公羊学作为自己的治学所向,阐发“三世”渐进之旨。今文经学因获得新内容,开始风行海内,到光绪、宣统时期,最终成为时代思潮。

今文经学的复兴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旋律,然而古文经学并未完全消沉。虽然就整个学界而言,仍坚守古文经学这一营垒的学者已为数甚微,但以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炳麟为代表的一批浙江学人,在古文经学领域独树一帜,且成就卓然,让古老的“汉学”闪射了最后的光芒。

德清人俞樾(1821—1907),宗法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为治经之道,治学严谨,著作等身,后人称誉他为同治、光绪

①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嘉业堂章氏遗书本,第6页。

②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53页。

③ 学术史上,素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说法。今文经与古文经,原是指以今文(汉隶)、古文(籀书)两种不同的字体写成的经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但是指所持底本字体的不同,更主要是对经典内容阐释方面的差异而言的。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关注现实政治,致力于发掘、发挥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今文经学彰显了经典的时代意义,植入了许多前人未见的思想,从而使经典的阐释历久弥新。古文经学讲文字训诂,留意典章制度,注重历史事实,具有浓厚的实证色彩;古文经学家具有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方法,所以他们常常能够对古籍做出正确的和比较合理的训释,从而彰显那些被今文经学家文饰、遮蔽的文本原意。

年间“东南大师”^①。他撰《群经平议》，为古代经籍校正误文，发明故训，解决了许多前人没能解决的难题；著《诸子平议》，对文辞深奥的先秦诸子之书做了精到的训释和考订，且多有精义阐发，为后人治诸子之学奠定了新的学术基础。

定海人黄以周（1828—1899），承其父黄式三之学，追孔门之“博文约礼”^②，毕生从事礼学研究。所著《礼书通故》百卷，考释古代礼制甚详。有学者称该书可与唐代杜佑《通典》相媲美，虽似有溢美之词，但也说明该著述确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瑞安人孙诒让（1848—1908），是光绪年间的古文经学大家。所撰《周礼正义》，是总结旧说以解释《周礼》的最完备的专著；所著《墨子间诂》，是研究墨子的名著；而《名原》《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等著述，是金石学研究之文，对许慎之作有多处驳难；《契文举例》则是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著述。梁启超说：“瑞安孙仲容（诒让），治《周礼》，治《墨子》，治金文、契文，备极精核，遂为清末第一大师，结二百余年来考证古典学之局。”^③

余杭人章炳麟（1869—1936），出身于书香世家，治小学极为严谨，究心掌故，博览群书，为光绪、宣统时期最负盛名的古文经学家。

二

如果说晚清时期俞樾、黄以周的研究，尚属纯朴学的范畴，那么孙诒让、章炳麟已开始有意识地吸收“西学”，为传统学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孙诒让后期所从事的“汉学”研究，已呈现出从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过渡的趋势。1901年，清政府试办新政，令臣工各抒己见。侍郎盛宣怀请孙诒让代撰条陈，孙氏乃草成《变法条议》40篇。翌年，改题为《周礼政要》问世。从其《序》中所称的“光绪辛丑，天子将变法自强，广求众议。友人属为具稿，乃以《周礼》为纲，西政为目，成此册篇”^④的写作原因和目的来看，《周礼政要》已是孙诒让试图融中西文明于一体的政论著述。全书采用类比的方法，先寻一段《周礼》原文，次作注解，再引欧美各国的有关制度、日本明治

① 齐耀珊：《杭州府志》卷一七〇，民国十一年（1922）本，第4674页。

② [清]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五十，清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第1230页。

③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1924年第1期，第31页。

④ [清]孙诒让：《变法条议·叙》；转引自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页。

维新以后的新政策相比附,说明“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丹之伦,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前之旧政已发其端”^①。他所提出的“中西学术原同贯”的口号与“中外文明倘同轨”的设想,表现出难得的近代精神。此前,孙诒让对墨学的研究,也已呈现出这种精神。他除了以古文字、经学的高深造诣,对《墨子》文本做精心校勘和训诂外,还独辟蹊径,试图运用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从墨子学说中挖掘出自然科学的精华。他在《与梁卓如论墨子书》中提到,《经说上》中“无久之不止”“有久之不止”两语,“似即力学永静永动之理,而与奈端(牛顿)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之理,亦复冥契”^②,便是一例。不仅如此,孙诒让还对《墨子》中蕴含的“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亚里士多德)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③这类中国学术近代化所需的哲学“精理”和“微言大例”做了阐发。

与孙诒让相比,章炳麟更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朴学中可与近代学术相接轨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把先秦诸子研究扩而广之,使之成为一门学问——诸子学,并将历来奉为一尊的儒家拉下庙堂,置于与诸子学平起平坐的纯学术门类的位置。梁启超曾说:“晚清先秦诸学的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④而先秦诸学的复活,章炳麟的诸子之学功不可没。章炳麟不仅在经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对近代语言学、社会学的创立起了重要作用。他精研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著述甚丰,相继著有《订文》《方言》《中国文字略说》《转注假借说》《小学略说》《二十三部音准》《小学答问》《文始》《新方言》等,在传统小学最终脱离经学的依附而成为独立的语言学的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他还继严复译《天演论》介绍达尔文和斯宾塞尔的社会进化论学说之后,于1898年,翻译了《斯宾塞尔文集》。此后又将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译成中文,对中国近代社会学的创立起了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孙诒让、章炳麟的研究方法与精神,已呈现出传统学术开始向近代学术转变的趋向。不过,近代学术的确立首先是从自然科学开始的。早在道光、咸丰年间,在坚船利炮的催逼和西学东渐的催化下,一批出自“畴人”门户的传统学者,开始以怀疑、求真的态度,运用实证、类比、分析、归纳的方法,探索、研究客观世界,吹响了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建立的前奏曲。

① 张宪文辑:《孙诒让遗文辑存》(温州文史资料第五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页。

② 张宪文辑:《孙诒让遗文辑存》(温州文史资料第五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③ 张宪文辑:《孙诒让遗文辑存》(温州文史资料第五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

其中浙江籍学者,如项名达、徐有壬、李善兰等,以其创造性工作,为传统的畴人之学向近代自然科学转变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确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杭州人项名达(1789—1850),为道光六年(1826)进士。他无意宦海沉浮,独钟数学,取得了不少为后人称道的成就。如:推广和概括明安图等人的成果,得到有关三角函数幂级数展开式的两个新的弦矢公式;所推导的椭圆周长和圆周率倒数公式,是中国数学史上关于二次曲线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所创立的确定无穷级数各项系数的待定系数法、开高次方的逐次逼近法以及与戴煦合作得到的有理指数幂二项式定理,也颇具价值。^①

同为道光年间进士的湖州人徐有壬(1800—1860),在政务之余,潜心历数,著述颇丰。其代表作《割圆八线缀术》,对三角函数幂级数展开式传入中国以来的研究成果做了系统的总结。所给八线互求十二式、大小八线互求十八式,使得三角函数展开式大体完备。其所创半符号式的缀术,使幂级数的表示得以简化,是微积分传入中国之前的一个创新。^②

曾为徐有壬幕僚的海宁人李善兰(1811—1882),与人合译或独译了《几何原本》(后9卷)、《重学》《植物学》《代数学》《代微积拾级》《谈天》等西学著作,涉及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众多领域,在译介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影响深远。他还撰有《则吉昔斋算学》13种,凡24卷。在尖锥求积术、素数的判别定理等方面多有建树,其中“李善兰恒等式”曾在学术界独领风骚。所提出的“今欧罗巴诸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而要消除这个差距,就必须“人人习算,制器日精”的观点^③,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可谓异曲同工。

畴人之学日益疏离经学而独立,传统的经史之学也应西学的催化而逐渐蜕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一批既受过传统学术训练,又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熏染的浙江籍学者,在译介和运用西学的同时,也将传统学术研究推进了近代大门。这些浙江籍学者,除上述的孙诒让、章炳麟外,代表人物还有沈家本、陈黻宸、夏曾佑、张元济、蔡元培、王国维等。

湖州人沈家本(1840—1913),光绪九年(1883)进士。他虽精于经学,但一生专治法学。曾任刑部右侍郎、大理寺正卿、法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资政院副总裁等职。著《历代刑官考》《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明律目笺》

① 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01—312页。

② 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29页。

③ 徐世昌:《清儒学案》第4册,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260页。

《文字狱》《刑案汇览》《读律校勘记》等，订《大清现行刑律》《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其学之所及已呈现出近代法律学端倪。

瑞安人陈黻宸(1859—1917)，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一生以执教为业，先后执教鞭于永嘉罗山书院、杭州养正书塾、京师大学堂、两广方言学堂、北京大学等。所著《独史》《地史原理》《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已透射出“新史学”的气息。

杭州人夏曾佑(1863—1924)，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曾官礼部主事、泗州知州，充两江总督文案，民国时曾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北平图书馆馆长。他对今文经学、佛学有精深的探究，在乾嘉考据学和传统诗文等方面有相当的素养。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用章节体编著的《中国古代史》，是近代中国人尝试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海盐人张元济(1867—1959)，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主张变法维新，曾向光绪帝上《痛陈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奏折等。后离京至沪，先任职于南洋公学，后主持商务印书馆。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出版了各种教科书、中外文工具书，及《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古籍丛书，影响深远，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绍兴人蔡元培(1868—1940)，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出以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学教育“五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新型教育的开拓者。

海宁人王国维(1877—1927)，从事文史哲研究数十载，生平著述60余种，批校古籍逾200种。他是近代中国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先行者，又是将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相结合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王国维以其创造性的研究，成为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杰出学术大师。

三

浙江发达的传统学术与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学术创新精神，在清初以来的中国学术变迁潮流中，不时掀起朵朵浪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学

人在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金石学作为专门之学，肇始于宋。刘敞的《先秦古器记》、欧阳修的《集古录》，为金石学专书之始。尔后，吕大临、李公麟、王黼、赵明诚、薛尚功、黄伯思、洪适等各有著述^①，沈括的《梦溪笔谈》、郑樵的《通志》，也涉及金石方面的内容。虽然宋代盛行的金石学至元明两代有所衰颓，但清代金石学发展迅猛，犹如奇峰突起，成为一时显学。

自清初至清末，从事金石研究者队伍之庞大，为前代所不及。这些学者或以金石考证经史，或研究文史义例，或精于小学，或笃嗜鉴赏，或专攻美术。其中不乏如顾炎武、黄宗羲、王昶、钱大昕、翁方纲、孙星衍、阮元、包世臣、吴式芬、吴大澂、孙诒让、叶昌炽等成就卓著、声名显赫的大家。所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滥觞。继此有钱大昕之《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亿之《金石三跋》，洪颐煊之《平津馆读碑记》，严可均之《铁桥金石跋》，陈介祺之《金石文字释》，皆考证精彻，而王昶之《金石萃编》，荟录众说，颇似类书。其专举目录者，则孙星衍、邢澍之《寰宇访碑录》。其后碑版出土日多，故《萃编》《访碑录》等再三续补而不能尽。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后梁玉绳、王芑孙、郭麟、刘宝楠、李富孙、冯登府等皆庚续有作。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而叶昌炽著《语石》，颇集诸派之长，此皆石学也。其“金文学”则考证商周铜器。初，此等古物，惟集于内府，则有《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等官书，然其文字皆摹写取姿，媚失原形，又无释文，有亦臆舛。自阮元、吴荣光以封疆大吏，嗜古而力足以副之，于是收藏寔富，遂有著录。阮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有《筠清馆金石文字》，研究金文之端开矣。道光以后日益盛，名家者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澂、罗振玉。式芬有《攔古录金文》，祖荫有《攀古楼彝器款识》，大澂有《窻斋集古录》，皆称精博。其所以考证，多一时师友互相赏析所得，非必著者一人私言也。自金文

^① 主要著述有吕大临《考古图》、李公麟《古器图》、王黼《博古图》、赵明诚《金石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黄伯思《东观余论》、洪适《隶释》、洪遵《泉志》、龙大渊《古玉图谱》、郑文宝《玉玺记》、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岳珂《程史·晋益杆》等。